本文的内在逻辑，是从“圣学”一语在两宋之际的运用，来观察宋代皇权的上升，以及理学如何在这过程中将其政治理念嵌入政治中。而问题在于，两宋皇权的上升问题并没有在学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识，我们也以为其中有含糊不清、前后抵牾的地方，因而不能对这一前提表示完全之肯定。在这种背景下，“圣学”一词实难承担由小窥大之责，既是因为“圣学”在两宋政治话语中并不算举足轻重，也具有较大的词义模糊的空间，只从表面观察，并不能理解说话当事人背后的语义所在。总的来说，作者张晓宇在基本问题还没理清的情况下，又一头钻进了细枝末节，难以识得大体，管中窥豹也成了盲人摸象。

若就本文中所给出的历史细节，还是有可记录的地方。

徽宗政治之手段、个人之威望都远不及其兄长和父亲，按照一般的历史经验来说，专制之权力上升之际，必要依托于强有力之人物，这似乎与徽宗一朝君主专制权力的上升相互矛盾。但如果我们将徽宗视为中央之代表，中央由居朝廷高位的士大夫与皇帝共同组成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，他们此时的利益有相一致处。看似是皇权的上升，其实是位居宰辅的士大夫以皇权之名义扩张中央之权力，在实际政治中，或许权力更为舒展的不是赵佶而是蔡京。当然，以上只是没有证据的一家之言，但逻辑上确实说得通，不过要更多的资料佐证。

比起漆侠以为高宗倾心二程之学的判断，本文显然给出了赵构在新学、理学看法上更为全面、立体的形象。赵构大概对任何理论的具体内容并不关心，也没有实践的想法，无非是要看哪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权位，打压异己。倒是秦桧何以崇尚荆公新学，没有更多的资料，目前也只能认为有对主战派压制的因素在内。